

社会转型中的困局

——以国民政府南京市社会局为考察中心

王 慎 著

DILEMMA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INSPECTION ON NANJING SOCI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本书系中国矿业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项目编号：syl04212）阶段性成果

社会转型中的困局

——以国民政府南京市社会局为考察中心

王慎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中的困局:以国民政府南京市社会局为考察中心 / 王慎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10-08922-3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社会转型—研究—中国
—民国 IV. ①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6669 号

社会转型中的困局:以国民政府南京市社会局为考察中心

Dilemma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Inspection on Nanjing

Soci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王慎 著

责任编辑:李月华 徐 昱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版式设计:章 雷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143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1/16,720×1000

印 张:15.75

字 数:240 千字

ISBN 978-7-210-08922-3

定 价:38.00 元

承 印 厂: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赣版权登字—01—2016—7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正所谓“欲善其事，先利其器”，社会转型需要健全的制度，而制度变革又常始于机构及其职能的调整，故无论改制者还是守制者，都非常重视政治组织机构在社会运行中的纽带作用。其实，机构的创设与废止及其职能的调整又经常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1927年后，国民政府为推行政令和变革社会，开始谋求机构的创设与健全。作为权力中枢之区，国民党南京市对机构的变更和职能的调整尤为重视，于是，社会局便应运而生。尔后，该机构在其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劳资纠纷处理和慈善公益事业规划等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因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社会变革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本项研究之所以选取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作为考察中心，缘由如下：

一方面，顺应了当前学界的发展趋势。其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社会渐行渐远，现代生活方式日渐浓郁。随之，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学科，社会转型理论自西方传入后，在国内的政治诉求下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具体至历史学界，研究者很快发现，运用该理论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将有助于更加清晰地描述其变迁历程，进而揭示其内在逻辑性。数十年间，经过学人不断耕耘，该理论得到快速

发展,可是,相较而言,从微观角度切入,见微知著式的成果却十分鲜见。故选取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丰富社会转型的相关理论。其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代史研究多止于五四运动,民国史则因政治和史观等因素的影响,长期被冷落,处于边缘化状态。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领域的开放,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民国史逐渐引起大陆学者的兴趣。^① 进入 21 世纪,民国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然成为学界很有特色的领域。所以,选取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作为考察对象,乃顺应历史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其三,“视角下移”和“追求历史本义的回归”亦系目前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的趋势。汪朝光先生认为,个案研究在民国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众多研究虽以个案为出发点,但并不仅仅停留在叙述历史的层面,而是注重以小见大,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讨论,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此外,“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也有重要意义”^②。社会局作为国民政府统辖区域内的市政或者县政下属机构,其执掌内容与民众生活存在诸多交叉,因而,本项研究还有助于管窥南京底层社会。

另一方面,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或启示。虽然“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不能直接结合”,但是历史是现实的回照,所以“历史研究应该为社会生活服务”。^③ 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敏感区”,紧急性事件呈突发和多发的趋势,这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社会矛盾凸现期,群众的利益意识日益觉醒,他们的利益诉求与企业、与部门甚至与政府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如何提高处置社会公共危机的能力和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这对执政党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④ 对此,各级政府都在积

^① 肖如平:《国民政府考试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序言第 2 页。

^② 赵利栋:《近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 7 期,第 83 页。

^③ [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 页。

^④ 刘子富:《新群体事件观》,新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1 页。

极寻求破解之道,但问题能否有效解决,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在积极从国外借鉴方法的同时,也要“以史为镜”。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以降,南京便是东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加之地理位置特殊,南京和近代中国社会结下不解之缘。1842年8月,《南京条约》的签订被学界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开端;1949年4月,南京的解放则又系中国近代社会结束的标志之一。此外,在国民党政权存续期间,南京作为首善之区,政治组织机构相对健全,社会变革也更具典型性。故而,选取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作为考察中心,正是基于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中,特别是近代史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至于研究方法,根据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特点,本项研究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换言之,就是为了避免主观臆断的成分和理所当然的推导,并力图在特定的历史空间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此来认识事物的特性。同时,还注意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间的制约因素,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分析与考察。

如果详尽阐述之,大致有如下三点:其一,对基本史实的尊重,根据史料来统率观点。在确定基本史实的走向后,本研究将主要依据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现有资料为研究基础,如实还原历史原貌。故书中观点的引出与分析,将从客观事实切入,而非纯粹的理论逻辑和某些假设,更排除任何杜撰的成分。其二,对机构各个方面的全面剖析。倘若力图再现历史发展的原状,揭示某机构内在的运作机制并阐释其作用,必须客观详尽地对每个细节进行探究。如对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的叙述,需要从多个角度给予审视,即不仅探究社会局设置的缘由和内在机制,同时还全方位地考察其基本职能以及社会影响,以免失之偏颇或产生歧义。其三,重视历史过程。“如果研究历史而忽视过程,则必然失之于肤浅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页。

乃至失真。”^①由此可知,历史本身就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所以研究者有必要将其作为整体来看待,否则便会割裂事实。基于此,为了在解读和分析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时,避免产生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情况,本项研究将最大可能地对每个细节都予以尽可能详尽的描述与分析。在1929至1937年这个时间段,关于南京市社会局的资料远没有战后那个阶段翔实、多样,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只有充分利用相关期刊作为补充,以期将叙述完整化。

因为历史本身的体系相当复杂,故在叙述过程中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此拓宽思路。根据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的基本情形,以及社会局的机构特点和职掌范围,本项研究还借助了社会学科中的某些研究方法。例如,社会学中的“尺度研究”方法,即通过比较研究对问题进行分析;再如,史学研究者经常运用的“数据分析”法也为本项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在还原具体的历史事件时,社会学方法中的归纳、演绎和因果关系等基本的研究逻辑也可以作为有效方法。总之,为保持学术史的科学性和方法学的合理性,史学研究者需要“多角度、辩证地研究民国史,使人们的认识更全面深刻、更符合历史实际”。^②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的创设、演变、机制运作以及职员构成情况,其中着重分析社会局设置的背景和缘由。关于该机构的发展与变革情形,本项研究依据时间线索予以纵向解读;至于分支机构,则分别给予横向解读。第二,社会转型背景下该机构职能的论述,此乃整个研究的主体部分。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职掌范围较为繁杂,大致有社会经济、劳动、公益慈善、教育文化以及合作事业和粮食行政等,对此将分别展开论述。第三,本项研究的结论部分,即在社会转型的理论框架下对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作整体评价,以此来总结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得失及实现社会转型的基本条件。总之,本研究希图通过视

①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页。

② 王春南:《民国史研究的新阶段——张宪文教授访谈录》,《民国春秋》1998年第4期,第62页。

角向下的方式让历史本义在最大程度上得以理性回归,使其尽可能接近事实之真相,以便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转型中的近代中国。

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尤其是个案研究,对档案资料的依赖程度更大,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民国史的个案研究应该与档案资料相结合。^① 有鉴于此,本项研究着重于零次文献的运用,即主要依据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的相关档案以及该机构在当时所刊行的内部资料。1945 至 1949 年期间的档案大约有 2513 卷,分为九大类;可是 1928 至 1937 年的档案则因时间、兵燹、政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现仅存 252 卷。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资料来源的原始性和丰富性,可以让叙述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外在定性概念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性、真实性和科学性。

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始于 1929 年初,止于 1949 年春,时间跨度仅为 20 年。在此期间,社会变迁甚巨,该机构的发展进程也曾深受影响。因日寇入侵,南京沦陷多年,1940 至 1945 年的汪伪政权虽也在南京设立社会局作为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机构,不过本研究并不对此傀儡性质的机构予以探究。这样,整个研究就被分为抗战前后的两个时间段。

^① 汪朝光:《50 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第 165 页。

目 录

前言	
学术史回顾	1
(一)社会转型的相关理论	1
(二)民国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相关研究	6
第一章 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基本形态	11
第一节 设置	11
一、社会局的创设及其缘由	11
二、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的设置	19
三、社会行政概念的界定	24
第二节 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之沿革	28
一、创设与健全	28
二、重组与消亡	33
第三节 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内部机制	36
一、职掌	36
二、职员、局长及经费	43
第二章 社会经济行政	57
第一节 农业与工业	57

一、农业行政	57
二、工业与金融行政	69
第二节 商业行政	79
一、基本商业行政	79
二、提倡国货	83
三、度量衡划一	89
第三章 劳动行政	97
第一节 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劳动行政概况	97
一、各业工会之改组	98
二、劳工教育之实施	101
三、其他	105
第二节 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调解劳资纠纷案例分析	109
一、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与劳资纠纷的关系	110
二、“有恒面粉厂”之纠纷	117
三、“南京排筏业职业工会”的重组与解体	123
第四章 公益慈善行政	133
第一节 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之公益慈善行政	134
一、公益慈善团体的改造	134
二、社会救济	149
第二节 救济院	156
一、战前阶段救济院的基本情形	157
二、战后阶段救济院的发展概况	166
第五章 其他行政	173
第一节 教育文化和风俗行政	173

一、教育管理	173
二、文化和风俗管理	183
第二节 民食行政	195
一、粮食管理所的一般行政	196
二、斛行管理	200
三、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地区的粮食保障	203
第三节 合作事业	207
一、合作事业概念的界定	208
二、南京地区合作事业指导机构	210
三、合作事业行政	212
结 论	216
征引文献与参考书目	226
后 记	238

学术史回顾

(一) 社会转型的相关理论

“社会转型”由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而来,最早见于台湾地区社会学家蔡明哲所著的《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中国台湾“国立编译馆”1987年出版)一书中。西方社会学家通常以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换。在现代化理论的语境下,社会转型的本质就是现代化的过程,所以,社会转型的概念系现代化理论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大陆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转型问题,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最早提出社会转型问题,并做出系统阐述。所以,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随后,学界尝试运用“社会转型”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①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迄今为止,社会转型不仅已成为描述和解释新时

^① 关于现代化和近代化概念的异同问题,学界存有不同观点:罗荣渠先生认为“近代化”概念不适合中国史研究,故此建议统称“现代化”(参见《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乔志强则持相反论点,即“现代”和“近代”相对“传统”而言,因而,可以将中国近代史过程称为“近代化”(参见《史林》1998年第3期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内涵基本相同,例如李文海先生就持此观点(参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的《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一文)。笔者认为,基于默认的前提,无论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在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研究中,其指代对象基本相同。

期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和社会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下面拟从两个方面予以介绍,分别如下:

一方面,关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系,学术界在研究社会转型问题时经常将其和现代化概念联系在一起,并对此做出论述。社会学家郑杭生、李强等曾指出,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其内涵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和同义的。^① 著名学者马敏也曾表示,“以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而引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本质上就是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②。其后,刘莹在其文章中做出如下判断,社会转型亦是社会质变,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包括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其实质是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使“传统”获得“现代化”的转型过程。^③ 21世纪初,陈国庆撰文指出,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期,这种社会整体发生大变化的情形,被称为社会转型。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即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过程。^④ 依据上述论点可知,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通过改变传统中国社会,使其彻底融入世界大潮,并成为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所以,严格意义而言,社会转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也属于现代化的范畴,或者说二者方向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社会转型困境问题的研究成果。长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保持领先地位的中国,却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步履蹒跚,跌宕起伏,对此,众多学者都试图探究其原委。社会转型理论引入中国后,立即给予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以独特的观察视角,为该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可能。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理论之父”的罗荣渠在其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

^① 郑杭生、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② 马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98页。

^③ 刘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我见》,《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第117页。

^④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刍议》,《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第16页。

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指出,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转型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乃是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相互交织,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得不到抑制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具有独特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传统同一性,加之外部环境恶劣,故突破原有发展模式异常困难。新中国的成立,则是通过革命完成了国家的重建,从而在根本上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为社会结构的变革提供了条件,因此,革命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罗先生也告诫,实现社会转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盲目崇拜、照搬外国模式的现代化未有不屡遭挫折者。^①

其后,历史学家高华1995年在文章中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与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关联,同时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阻碍了现代化因素的成长。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较弱,无法全面调动社会力量,而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必需的力量。传统的儒家学说则内化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层,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障碍,因此,近代中国人显得迟钝与僵硬,很难随着形势变化而调整政策。

国民党政权的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化发展的需要,给社会转型带来了希望。然而,1928年后,国民党政治行为的指导中心系“新权威主义”,虽然这样的统治策略可以快速积聚资源,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但是,该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这样情形,其结果就是“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不能真正建立”,^②社会转型只能是空中楼阁。据此,高华作出判断,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②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第6页。

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和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人难以逾越的障碍。高华还补充道,“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因此,他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的重整,是实现真正社会变革的关键。

对此问题,马敏曾作过如下思考,“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迟滞,从社会结构本身看,似有两重较重要的原因:其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重结构因素(传统封建因素,本国资本主义因素,外来殖民因素)的日益牵制;其二,与自发型现代化的西方和后发型现代化的日本等国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由于在农业文明环境中达到高度成熟状态,因此,格外强韧和根深蒂固,难于实现自身的转型”。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非但不能加速业已发生的过渡和转型,反而成为这一过渡的障碍,并造成空前的混乱、迷离、动荡和真空”。

此外,马敏还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对问题进行了论述,“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或许,在二者的结构和互动关系之中,便隐藏着中国现代化始终难以克成的谜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条主线看,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所以显得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其实在于缺乏一个国家之外的相对独立的、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这不仅使传统中国社会难以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且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充分,社会契约关系不普遍,中间社团组织的缺乏,法律意识和商品意识的淡薄,更直接造成中国社会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困难。^①

俞祖华认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具有立志推进现代化的现代领袖取代传统领袖掌握政权,进而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可是,在 1949 年之前,步履蹒跚的古老中国“迟迟没有出现

^① 马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第 101、103 页。

强大的、具有现代取向的中央政权”。所以，“缺乏培育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引导社会变革的现代政府结构，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延误的决定性因素”^①。刘莹在其文章中做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没有按照常规，即先开始进行经济转型，再进行政治转型，再进行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实际上凸显出近代中国化缺少“内在原动力”。^② 故此，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其实是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迟滞。

还有学者试图从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顿问题。陈曼娜在其文章中做出如下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在地域和产业结构上发展为“微弱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这种特殊的经济景观从地形分析看是二元结构与三种经济因素并列、对立的产物。在诸因素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它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各种经济因素基本属性的含混与模糊，从而引起社会结构矛盾引导的无序化和发展取向的多维性”。这样的“多元化的取向及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迂回”，则给近代中国人带来了不尽的迷茫和困厄。^③

文化方面，方晓珍认为，“西方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时，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性”。所以方晓珍建议，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应当从文化和文化哲学中寻找。^④ 赵炎才的观点较为独特，他认为“外漏”意识滞缓了中国

^① 俞祖华、季翠兰：《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34页。

^② 刘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我见》，《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第119页。

^③ 陈曼娜、陈伯超：《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经济结构为透视点》，《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0页。

^④ 方晓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57页。

近代化的进程。因为近代经世致用的突出之点是“用”，所以，“补漏”意识基本上居主导地位。这种意识的直接危害是使中华民族在艰难的近代化过程中总是处于消极应对、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浪费了中国近代化的许多机遇，滞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①

总之，社会转型理论传入中国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社会学者首先对理论本身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如社会转型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分析框架等，这些成果为该理论的实际运用提供了条件。历史学界则将其和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试图通过社会转型的角度来审视国人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得与失。依据文献资料可知，新世纪之前，学界研究社会转型的视角较为宏观，大都以此为理论从整体上来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近十年间，学界更多倾向于运用该理论解决具体问题，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此处不再赘述。

依据文献的梳理还可知，虽然社会转型理论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拓展了研究领域。但是，通过微观的角度来总结 1949 年之前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还略显不足。所以，以某个事例为中心进行考察，或者仅仅研究近现代社会的某个阶段或者机构，也能够促使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细致化和深入化，并有助于学人更为深刻地揭示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二）民国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相关研究

回顾和梳理民国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相关研究，将有助于叙述和研究国民党南京市社会局。依据时间的线索和资料的类别，下面从三个层面分别做出介绍。

宏观层面，主要为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

^① 赵炎才：《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基本特征刍议》，《安徽史学》2003 年第 2 期，第 23 页。